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美] 保罗·巴兰 著 蔡中兴 杨宇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主编 李慎明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美] 保罗·巴兰 著 蔡中兴 杨宇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美)保罗·巴兰著;蔡中兴,杨宇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671-7

I. ①增… II. ①保…②蔡…③杨… III. ①经济增长理论 IV.
①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757 号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ZENGZHANG DE ZHENGZHIJINGJIXUE

[美]保罗·巴兰 著 蔡中兴 杨宇光 译

装帧设计:刘沂鑫 刘 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6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插页 1

ISBN 978-7-100-12671-7

定价: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Inc. 1978

U. S. A.

根据美国每月评论出版公司 1978 年版本译出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顾问：徐崇温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编委会副主任：邵文辉 张拥军 陈兴芜

编委(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陈学明 陈众议 程恩富 邓纯东 段忠桥 郝立新

侯惠勤 胡振良 黄 平 姜 辉 梁树发 刘同舫

鲁品越 王凤才 韦建桦 徐俊忠 颜鹏飞 张 宇

张树华 张顺洪 张一兵 周 弘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③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109页。

②《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③〔日〕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于永妍、王伟译,红旗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6页。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 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 5000 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

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1 日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简评

程恩富* 侯为民**

一、本书作者和写作背景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是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保罗·亚历山大·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生于俄国乌克兰一个医生家庭，1925年曾赴莫斯科大学学习经济学。1928年赴德国，在柏林农业研究院工作，其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保罗·巴兰退出德国共产党，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期间，他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作过短期研究，并为希法亭主编的《社会》杂志撰稿。1939年移居美国，进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苏联、德国和波兰问题专家，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师。1951年后一直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应当说，保罗·巴兰的早年经历，对其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有重要影响。与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者不同，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总体上持批判态度。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保罗·巴兰提出

*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 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并以此为重点，着重研究了发达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其后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随着该书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近年来在国内也受到关注。最新译本（蔡中兴、杨宇光译）系根据美国每月评论出版公司1978年版本译出，由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发行。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写作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本书出版之前的十年，正是资本主义战后恢复的黄金十年，也是资本主义垄断力量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时，西方经济理论界新古典主义开始抬头，结构主义理论盛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理论辩护手。然而，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暂时缓和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但又在国际层面呈现出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显得困难而曲折，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给予合理的说明。这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尽管发展迅速，但其理论基础却在新古典理论和民族主义经济理论之间摇摆。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为资本正名，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市场扩张和科技进步，却忽视或掩盖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所起的作用，因而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事实上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证。而民族主义理论则试图立足于封闭的孤立体系，探索建立完全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民族经济发展理论，却忽视了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影响。巴兰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范围内分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才能反映当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巴兰对传统发展经济学反思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中，保罗·巴兰是美国大学中为数甚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之一，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境地。

二、本书的体系结构与主要内容

作为研究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先驱者，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一，资本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能使大多数工业先进国家的下等阶层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加剧了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居民的贫困化。在世界生产体系下，资本对不发达国家的输入有效地破坏了落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并用市场契约替代传统的宗法关系，进而将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不发达国家。其二，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使不发达国家成为揉合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缺陷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其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贫困，使国内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担负社会领导任务所需的经济力量和政治自信，反而会一味地顺应现存的秩序。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唤起和领导人民群众，后者必然被推向社会主义激进派阵营，从而反过来将资产阶级本身推向与寡头和垄断势力的结盟。其三，不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着比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更大的难题。阻碍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储蓄短缺、缺乏外界有利条件等，还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巴兰指出外来的经济援助，不可能代替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国内变革。不发达国家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出路，只能在于改革现有的政治结构，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全书包含一个序言、一个导言和八章正文内容。序言是对作者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的总结，导言是围绕增长问题提出的研究建议。正文的八章可以作为四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部分来阅读和理解。即：第一章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提出了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切入点和面临的难题。第二章构成本书的基础理论支撑点，作者提出了“经济剩余”这一范畴，并联系该范畴对不同社会制度下“剩余”的本质、内涵和作用等进行了论证。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至第七章中，作者从历史、现实条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等方面，重点阐释了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作为本书的写作目的，巴兰在第八章中，从理论上重点论述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和应采取的政策取向。

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论。在该章中，巴兰对经济学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论述。他从理论上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分配而非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指出了其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学。在现实层面上，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定义和计量基础上，需要采取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框架。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西方以经济援助为手段的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及其对不发达国家带来的后果。

在第二章中，巴兰对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经济剩余”进行了阐述。巴兰认为，可以从三种角度对经济剩余概念进行理解：（1）实际经济剩余。它是指社会现有的实际产量和实际消费量之差。实际消费量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所以，实际经济剩余就是一般所说的储蓄或积累。（2）潜在经济剩余。它是指在一定的资源和

技术条件下，当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能生产出来的产量与基本消费之差无法从统计资料中获得潜在经济剩余的数据。巴兰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潜在经济剩余，在实际经济剩余之外还包括一部分人的过度消费，后者使实际消费大于基本消费。由于非生产性工作的存在，生产设备和生产组织的不合理，以及失业而引起的产量减少。(3) 有计划的经济剩余。它是指在所有资源可以有计划地最优化使用条件下所达到的最优产量，和某个事先选定的最优消费量之差。巴兰将此概念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增长。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巴兰将“经济剩余”概念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进而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第三章首先从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展开，阐释了资源配置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进一步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过程中的经济剩余及其使用以及投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间的关系等问题。巴兰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竞争资本主义相比，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长期投资不足是一个必然现象，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难以维系。在第四章中，巴兰继续从第三章的结论出发展开分析，他论述了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非生产性工人与垄断资本统治的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通过政治手段维持资本统治的本质，并指出垄断资本走出投资不足需要采取互相对抗的对外贸易方式。巴兰在该部分还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论点，一是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包括政治层面的。因为它会导致工人贵族的产生，通过工人贵族来维系其统治。其二是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实施只能暂时缓和投资不足问题，但由于其导致的通胀及税收相对下降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在长期中无力走出困境。其三是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特点，注定了其走向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走向战争的必要性。

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问题的分析。在第五章

中，巴兰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本质和根源，指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直接相关的。在该部分，他重点用印度和日本的例子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印度在发展问题上的困境是由于它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日本由于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在发展中取得了成功。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严重阻碍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和现实的可能性。

在第六章中，巴兰进一步分析了不发达国家难以借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因。他从经济剩余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出发，论述了农业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在总剩余的使用上，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集中于商人和放债者、工业（实业家）、外国资本（采矿业）和国家。巴兰认为，无论是在利润和就业，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都带来了普遍的冲击。后者不仅体现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剩余方面受到直接损失，还体现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变革限制了其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可能性。值得指出的是，巴兰在该部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人口的大部分依赖于农业，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虽然可以短暂地改善农民生活，但却会降低总产出并使原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目的的少量经济剩余消耗殆尽，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在第七章中，巴兰针对外国资本扩大了不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并对作为非农业部门左右经济剩余的第四个部门——国家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巴兰通过三种分类（殖民地、买办政权和新政类型的政府），并联系外国投资和政府活动，阐述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结构形态问题。他指出，将不发达问题归结于缺乏企业家精神是错误的，而人口压力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对不发达国家

发展构成主要威胁。

在最后一章，巴兰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趋向进行了估计和分析。他认为不发达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可能和最好出路是社会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很可能会招致帝国主义的敌视和战争压力。作为应对帝国主义的对策，巴兰认为革命成功后的政权应及时转向用计划经济剩余的观点来管理社会。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同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正确处理安排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比例、合理抉择资本集约化生产和劳动集约化生产以及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经济关系。

三、“经济剩余”是核心概念

保罗·巴兰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剩余”作为其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所说的“经济剩余”，指的是一定时期中社会总产量和总消费量的差额。借助于这一概念，保罗·巴兰对不发达经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分别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后来也成为西方国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和参照。

在用“经济剩余”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时，保罗·巴兰认为，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机制决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一方面，大垄断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者，垄断公司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有助于其实现利润最大化，使经济剩余的绝对量占国民收入之比急剧增大。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又使得经济剩余难以吸收，加剧了经济剩余增加的困难，使增长难以持续。

在保罗·巴兰看来，对经济剩余的吸收，一般是通过消费、投资和浪费三种方式进行。消费虽然会增加，但其在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有下降的趋势。投资能够吸收经济剩余，但却使生产能力的扩张相对过度，造成经济剩余的吸收更困难，并最终减少投资。因此他